



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

Research on the Shi Family in Siming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夏令伟 著

海外借



科学出版社



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

Research on the Shi Family in Siming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夏令伟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南宋四明史氏家族为研究对象,对其历史、政治、文学、文献等方面的问题加以探讨,重点揭示了其作为政治家族与文学家族的重要特征。本书认为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确实在整个宋代家族中具有典型意义,不但发展迅速,政治地位与成就冠绝一时,而且在文化建设上也自有特色,涌现出一批以学术或文学见长的代表人物,对四明乃至全国都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本书可供历史学、文学等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和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夏令伟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03-059406-8

I. ①南… II. ①夏… III. ①家族-研究-中国-南宋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2671 号

责任编辑:任晓刚 / 责任校对:王晓茜
责任印制:张克忠 / 封面设计:无极书装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6 1/4

字数:450 000

定价:10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序

彭玉平

令伟君的《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原是 2009 年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经过近十年的修订补充，终于要付梓了。一本书被悄然打磨了十年，这在一个快速甚至飞速发展的时代，未免节奏太慢。但如果以十年之思求得“放心”，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因为在漫长的学术史年轮中，十年几乎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数字。也许当今之世，很多事情要讲“效率”，而学术原本是素心人深思独想之事，需要经过咀嚼含玩，才能出以纯净之思。我一直认为，如果把学术简单地与“效率”挂钩，这样的学术难免令人担忧。

令伟的博士生导师是邓乔彬先生，不用说，这篇序最合适的作者也应该是邓先生。但此时此刻，邓先生已入幽明境中半年多了。此情此景，每思及此，辄生悲凉之心。邓先生从上海来到岭南比我晚了数年，或许是因为同研词学之故，邓先生慨然许我以忘年，我们除了在广州的博士论文答辩、学术会议频繁相聚之外，私下的宴聚也不算少。听邓先生说词学发展，讲学界典故，臧否各色人物，都曾是我饶有兴趣的事。但这样的时刻最终停在了 2018 年 1 月 30 日，邓先生因病于上海溘然去世。2017 年 10 月 28 日，也就是在邓先生去世前三个月，我曾借在复旦大学参加“第二届中华诗词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之机，去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看望过他。据说当日正值邓先生农历生日，来病房探望之人穿梭不息，因佩戴呼吸机，体质极为衰弱，邓先生面对人来人往，始终未发一语，甚至未有任何表情。而在我去到他病床前，握手问安时，邓先生居然难得地露出了笑容，这让围在他病床边的学生们很是惊讶和惊喜。其实我还感受到邓先生握手时的一点微弱力度。邓先生这艰难的一笑和勉力的一握，自此便永久地镌刻在我的心里了。

听令伟说起过，本书的最初起因与史浩的大曲有关，也得到了邓先生的大力支持。由对史浩大曲的研究进而推广至对其整个家族的研究，这也可以说是从文学到史学研究的自然过渡。在整个宋代家族中，四明史氏家族确实非常显赫，除了一门三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这种非凡的政治地位，在文学、学术史上，史氏一门也是名家辈出，其影响也由四明一

地而辐射全国。若研究南宋的文化，史氏家族的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政治与文学也必然构成其家族研究的两条主线。

全书除绪论、结语、附录之外，凡四章，分别就家族发展、家族政治、家族文学与家族文献展开。各章较多新文献、新论题，诸多新论之处，读者可自行翻检相关章节。我还是回到大曲的主题。因为长期阅读王国维著述之故，我注意到王国维的《唐宋大曲考》一文曾对史浩《鄮峰真隐漫录》中的《太清舞》《花舞》《渔父舞》诸曲是否属于大曲提出过质疑。质疑的理由是这些曲目均为叠加数曲而成，而缺乏大曲体制中应有的排遍、入破之名。一直以来，我的研究重点在词学一途，然而对大曲的体制尤其是体制的变化实际上所知不多，因此也就无法判断王国维之质疑究竟能否成立，但自认为应该涉及大曲的尊体与破体问题。今细读令伟之书，方知他追源溯流，已霍然可释王国维之疑。若《太清舞》之曲，其中《太清歌》《道引曲子》《破子》《步虚子》四曲，当为大曲之摘遍；《花舞》一曲，除了《蝶恋花》一调外，主要采用大曲《折花三台》；《渔父舞》的形式与转踏为近，但所用词调《渔家傲》亦可用于大曲如《采莲舞》中。凡此种情况都表明，随着宋代教坊用乐的简化与俗化，以及宫廷乐舞表演范式的变化，南宋大曲已经在体制上呈现出以摘遍为大曲、以词调入大曲的重要变化，属于比较典型的破体。而史浩生活的时代正是宫廷应制之风盛行的高宗、孝宗时代，他早年所历官职也需多撰应制文字，而以宰相身份参与宫廷宴会，自然对大曲体制的新变了然于心，这也是他笔下的大曲不同寻常的原因所在，这是特定时代造就的文学性的政治和政治性的文学。令伟君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考察大曲的源流变化，将现象性的梳理与理论性的思考融为一体，相信他的结论是经得住学术史检验的。

我还要特别拈出此书在文献上的诸多贡献。史氏家族虽当时声名远扬，但其家族文献其实散失严重，少人问津。令伟君旁采逸搜，一方面查阅史氏档案；另一方面并就其题跋、碑碣墓志、《鄮峰真隐漫录》等做了辑录或考论，附录两种《宋元四明史氏碑碣墓志汇辑叙录》《史浩〈周礼天官地官讲义〉辑录》即可见其文献搜罗与考订之功。我一直认为，凡学术研究，若无新文献或新观点，勿刻意为文，因为既不能自作主张，又不能随意虚构，自然难成自家篇章。但有了新文献，也须有大眼界，才能照出文献的光彩。我在《倦月楼论话》中曾说：“新文献乃学者寤寐思服者，然亦可遇而难求，至少难以一求再求。故觅得一节珍贵文献，岂容易哉！若无深远之眼界，新文献亦难当其用，甚者才见天日，又蒙尘埃矣。盖人苦求文献，文献亦待沽于人。若新文献欣欣然而至，尔却只顾以一瞥，甚至懒

予理会，随意放过，亦真如暴殄天物、全无心肝者。”我引述这一段语言，意在说明，令伟笔下的文献往往能闪着理论与思想的光芒，有的更是“才见天日”即放光芒。这种兼重文献与理论的学思，相信能引领着他在学术上走得更稳健、更高远。

此书在史实考订上用力甚勤，新的见解亦多，但关于文学的考量我还是读得不尽兴。这大概也是“文学”二字未能题在书名上的原因所在。但以令伟君的理论眼光，若有更多的文学作品进入他的视野，他应该也会有更多的体悟和发现。但那会不会是另外一部著作的主题呢？我突生异想——当然也只是纯粹想想而已。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史氏家族历史论	19
第一节 概观：从门族之微到相门之盛	19
第二节 发轫期：寒素之家的艰难探索	24
第三节 兴盛期：官绅之家的傲然树立	29
第四节 衰落期：权势之家的风流云散	45
第二章 史氏家族政治论	49
第一节 史氏相权与赵室宫廷	49
第二节 史浩与张浚之争	75
第三节 王十朋论史浩	91
第四节 史弥远与胡梦昱案	105
第三章 史氏家族文学论	127
第一节 史浩的诗词	129
第二节 史浩的大曲	171
第三节 江湖诗案中的群体关系及诗的功能转换	195
第四章 史氏家族文献论	211
第一节 史氏家族档案及其题跋的形态与意义	211
第二节 宋元四明史氏碑碣墓志综论	219
第三节 史浩《鄮峰真隐漫录》考论	231
第四节 文献记载与史氏评价问题	246
结语	278
附录一 《史家祖宗画像、传记及题跋》之题跋辑录	281
附录二 宋元四明史氏碑碣墓志汇辑叙录	286
附录三 史浩《周礼天官地官讲义》辑录	345
附录四 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论著叙录	375
参考文献	397
后记	408

为引人注目。清代全祖望《甬上族望表》卷上曾排列史氏、楼氏、丰氏、郑氏、汪氏等数十家，足见当时四明衣冠之盛。在这些家族中，全祖望又以史氏居首：

史氏本居城中西湖之上，至八行先生诏始居东湖。及子孙贵，城外东湖之七十二山，城中西湖之十洲，归史氏者皆十七焉。史氏一门宰相三人，执政二人，视执政恩数大臣三人，侍从二人，卿监四人，其余不能悉数也。而不列于望者，则别有取焉：八行先生诏第一；忠定推荐乾、淳诸大儒，有功儒林，第二；和旨先生不受忠定推恩之官，父子甘于隐退，第三；忠宣如荆公之有魏公，不阿其兄，第四；独善先生第五；自乐先生足与独善齐名，第六；文靖不护其子，第七；鸿禧君不阿其祖，第八；璟卿争夺情，以身殉之，第九；果斋先生力绍朱子之学，第十。诗人则友林先生，文人则蓬庐。共十二望。^①

这里所说“城外东湖之七十二山，城中西湖之十洲，归史氏者皆十七”的情况道出了史氏家族的繁盛一面，而人物辈出的景象，也显示出史氏家族的发展成就与显赫地位。下面笔者依据不同表现，将其分为三类。

（一）政治型人物

此指官高位显者，全祖望所谓“史氏一门宰相三人，执政二人，视执政恩数大臣三人，侍从二人，卿监四人，其余不能悉数也”，即属此列。不过，这份名单并非全祖望所创，而是取自元代袁桷。

丞相三人：浩、弥远、嵩之；执政二人：才、宅之；视执政三人：弥坚、宇之、岩之；侍从二人：弥大、弥忠；待制二人：弥正、宽之；卿监四人：弥恣、望之、定之、宣之。进士二十六人：才、浩、弥大、弥远、弥忠、弥愈、弥逊、弥谨、弥恣、弥应、弥巩、岩之、嵩之、佺之、望之、及之、本之、能之、胄之、俊卿、有之、常之、即之、介之、蒙卿、唐卿。^②

① （清）全祖望著，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639页。

② （元）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卷五《节妇》之《冀国夫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217—6218页。

不但具言官位、姓名，而且又备“进士”一项，在标榜史氏家族政治人物之盛的同时，尚能揭示其成功之源途。当然，袁楠所列亦有缺漏，如言“侍从二人：弥大、弥忠”，而据《宝庆四明志》卷一〇“兄弟侍从：史弥大、弟弥坚；史宅之、弟宇之”^①，则史宅之、史宇之兄弟亦尝居于侍从之列。因此，上述名单应有进一步增补的空间。

（二）道德型人物

又可分为两类言之：其一，独善其身与不附权贵者。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皆避于政治权势，而有不同侧重。前者以史诏、史涓与史弥林（和旨）父子、史弥巩（独善先生）、史弥应（自乐先生）五人为代表，后者包括史弥坚（忠宣）、史弥忠（文靖）、史守之（鸿禧君）、史璟卿四人。其二，潜心学术与有功儒林者。这以史浩（忠定）、史蒙卿为代表。两人于朱学或举荐其人，或授受其学，故受到全祖望的肯定。实际上，史氏家族以学术立名者大有人在，今翻检《宋元学案》一书，即有史简、史诏、史浩、史弥忠（史渐附）、史弥坚、史弥巩、史弥林（史涓附）、史守之、史定之、史宾之、史蒙卿等十余人名列其中。他们作为史氏家族的表率，一方面学习、推扬乡贤之学、陆学或朱学（史简学于王致，史诏学于楼郁，史浩学于张九成，史弥忠至史定之等六人学于杨简，史宾之学于丘密，史蒙卿宗朱学、传于程端礼和程端学兄弟）；另一方面则积极建构、传承家学（如所谓“史氏家学”“八行家学”“沧州家学”等）^②，体现出学术立身、传家的用心。

（三）文学型人物

全祖望共提及两人：一为诗人史弥宁（友林先生）。二为文人史公珽（蓬庐）。

史弥宁有诗集《友林乙稿》传世，全祖望云：“今读其集，萧然物外，不能见其为阀阅家儿，其亦同叔、南叔之亚也欤。”^③可见，全祖望在这里仍持道德眼光，较少言及史弥宁的诗才、诗艺。相比之下，其他人所评更

① （宋）方万里，罗澹纂：《宝庆四明志》卷一〇《衣冠盛事》，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126页。

② 参见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中有关史氏的记载，分见于该书卷六《士刘诸儒学案》、卷四〇《横浦学案》、卷七四《慈湖学案》、卷七九《丘刘诸儒学案》、卷八七《静清学案》等处。

③ （清）全祖望著，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78页。此条引文中，“其亦同叔、南叔之亚也欤”，同叔指史弥远，南叔指史弥巩，两者行实不侔，将之并列比拟，当误。

侧重于其诗人角色，如钱大昕云：“诗虽不多，颇有佳句，如‘云峦著色四时画，石濂有声千古诗’‘一毛不拔管城子，冷眼相看石丈人’，置之涪翁集中，莫能辨也。”^①四库馆臣云：“集中近体诗居多。其《诗禅》一首云：‘诗家活法类禅机，悟处工夫谁得知。寻著这些关楔子，国风雅颂不难追。’观其持论，似亦以妙悟为宗，与严羽之说相近。然命意遣词务取鲜新，乃往往伤于纤仄，无所谓镜花水月之意。则所谓妙悟者，特一韵之奇、一字之巧而已。特其点缀映媚，时亦清警，沙中金属，要不可谓之非宝。”^②对于史弥宁诗歌的特点及缺陷，把握十分到位。

对于史公珽，全祖望以其为文人，可参照《万姓统谱》中的一段记载：

史公珽，字搢叟，鄞人。丰姿秀爽，词气温恭，早志于学，通诸经子史，尤邃于《易》。延祐间，诏郡守举行堂试法，公珽方弱冠，屡占前列。家居教授生徒，务底于成。程端学荐于甬东书院主奉，即弃去。游西州，陶写性情。论宋季台阁故事，亶亶终日，及忠臣义士死节者，必慷慨流涕。广平李尧民七丧不举，公珽解囊，中半赙之，且为著哀词，告其常所往还者。自号蓬庐处士，所著有《蓬庐稿》《易演义》及《象数发挥》若干卷。^③

则史公珽已为元人，行事为文可谓有古风。

以上是对全祖望《甬上族望表》中所列“西湖史氏”人物所做的一点类析，区分依据乃是这些人物的主要活动领域。不过，应该说明的是，这些人往往兼有数长，并不能作简单的归类划分。如史浩不仅位至宰相，著述亦有多种，涉及学术、文学等多个领域，表现均很出色。只是由于家族存在与发展的根本乃在于人，所以，由单一到多样，由个别到群体，上述区分虽不甚严格，但依然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南宋史氏家族的个性特征与整体面貌。事实上，人们常以这种方式相观照，以下数家之见值得重视。

其一，以德行称许史氏家族。前引全祖望所取史氏十二望，着眼于德行、文章一面，政治则次之。若以此而论，史氏家族当为道德文化之家。全氏这一态度不难理解，作为清代大儒、浙东史学大家，道德标准自然居

①（清）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28页。

②（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三《友林乙稿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97页。

③（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七四，《中华族谱集成·万姓统谱》第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96页。

于人物评判的首要位置；又因其为四明人，故有强烈的推尊乡贤之意。其《答九沙先生问史学士诸公遗事帖子》云：“史文惠教诸子孙，从游于杨、袁二先生之门，又延沈先生之弟季文于家，故其诸子孙虽有大堕家声者，然亦多以不附宗袞有声者。《宋史》罣漏，漫无考索，故如固叔、南叔、定叔风节一例而不能备录，为可惜也。”^①责史氏“大堕家声者”而誉“不附宗袞有声者”，鉴于“《宋史》罣漏”，故对后者表而出之。

其二，以政治评论史氏家族。宋代黄震在咸淳四年（1268）为史浩曾孙史猷夫作《宝善堂记》，中云：“我朝蝉联赫奕，钟鼎相辉，孰有如君家之盛！世或以其太盛也而掩其善，不知其所以能盛者，正以其善尔。是岂容于不宝哉！”^②虽将“善”作为史氏“蝉联赫奕，钟鼎相辉”的原因，仍坠于道德眼光，但如此解释，本身就说明了作者对史氏政治之盛的感叹。元代戴表元则将史氏与韩氏、吕氏两家相门相提并论。

宋时，宰相世家多言韩、吕。二氏之盛皆蔓延至今，然问其人之贤，必多言吕氏。夫吕氏岂能皆贤而无过哉？君子爱之也，从而为之辞。至于韩氏，忠献之后一跌而不可支，遂使不得容于世论，他有令善者亦若分受其辱。余尝疑之。盖韩也多敏于才，吕也多逊于学。逊而学者，人常进之；敏而才者，人常退之。此人事，亦天道也。渡江以后，世家之盛独在史氏，遂欲与韩、吕为三。文惠开国，淳风粹猷，载在方册。生其门者，人怀卿辅之望，两制以下，或所不屑。^③

对南宋史氏相门的崛起做了揄扬，其中所谓“生其门者，人怀卿辅之望，两制以下，或所不屑”，则可看出史氏家族成员对于政治地位的强烈追求。后人亦多如戴表元一样言及史氏相门，但常见批评，如清代史学家赵翼。

宋则有三世为相者。吕蒙正相太宗，其侄夷简相仁宗，夷简子公著，哲宗时亦为相，传赞谓世家之盛，古所未有。南宋则史浩相孝宗，其子弥远相宁宗、理宗，浩孙嵩之（弥远之侄），理宗时亦为相。其

① （清）全祖望著，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28页。

② （宋）黄震：《黄氏日钞》卷八六《宝善堂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04页。

③ （元）戴表元：《剡源集》卷一八《跋史和旨诗卷》，《丛书集成初编》第205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页。

再世为相者：韩琦历相仁、英、神三帝，其子忠彦，徽宗时亦为相。按琦固名相，忠彦亦不失父风。史氏则弥远擅废立为无君，嵩之谋起复为无父，家门虽盛，而名节有亏。若吕氏奕世勋猷，辉映史册，可谓极盛矣，而公著于重圭袭组之后，不以门阀自高，益能守正不挠，为时名相，尤不可及也。^①

赵翼认为，史氏虽与吕氏并为“三世为相”，但“史氏则弥远擅废立为无君，嵩之谋起复为无父，家门虽盛，而名节有亏”，终落一等。虽然遭受到了批评与苛责，但史氏家族在政坛上的地位，以及对南宋政治的影响却是无法忽略与抹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将史氏家族看作政治家族并不过分。

其三，以文学观照史氏家族。如张剑、吕肖奂在《宋代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一文中，就将“鄞县史氏（史浩、史涓、史弥巩、史弥逊、史弥宁、史嵩之）”作为宋代文学家族之一^②。与之相比，周芬、张如安的《论宋代鄞县史氏家族的文学创作》一文则在肯定史氏家族政治成就的前提下，关注其文学成就。

史氏家族不仅权倾朝野，而且作家辈出，还是一个罕见的文学家族。只是他们的政治地位绝对性地压倒了其他方面，人们更多关注他们的历史功过，而很少注意到这一家族的文学创作方面。而后人也因为史书上对这一家族政治上所做出的一些负面评价，因人废言，导致了整个家族诗文作品的大量失传，以至于清人编辑《史氏世宝集》和宗谱，收录的诗文也极为有限，而这又反过来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史氏家族文化成就的深入探究。^③

他们认为史氏家族还是一个罕见的文学家族，并从政治角度分析了史氏家族文名不显的诸多原因，可谓灼见。

综合成员的表现及人们的评价来看，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确实在整个宋代家族中具有典型意义，不但发展迅速，政治地位与成就冠绝一时，而且在文化建设上也自有特色，涌现出一批以学术或文学见长的代表人物，对

①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57页。

② 张剑，吕肖奂：《宋代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第129页。

③ 周芬，张如安：《论宋代鄞县史氏家族的文学创作》，《宁波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60页。

四明乃至全国都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鉴于这种多样个性与特殊地位,本书即以史氏家族为研究对象,对其历史、政治、文学、文献方面的问题加以探讨。

二、研究综述与研究展望

如果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戴仁柱(Richard L.Davis)从事这一家族研究算起,学术界对于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的研究已有40多年。在此期间,相关研究论著甚多。这从张如安编的《宁波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资料索引(1900—2008)》^①和他编著的《宁波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资料索引续编(1900—2014)》^②两书之“史浩”“史弥远”“史嵩之”“史氏家族”“东钱湖考古与文物”诸条下所收的研究论著情况中即可窥见。检视这些论著,可见40年来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1)以研究时间、地点来看,它滥觞于海外,先影响及我国台湾,后鼓荡于我国其他地区。(2)以研究方式来看,综合研究与个体研究相互映衬、相互融合,家族史的勾勒离不开对代表成员的重点探究,而代表成员的个体研究往往又需要置入宏阔的时代、政治背景中才能有所创新。(3)以研究内容来看,家族文献、家族史、家族政治、家族文学等都受到一定关注,跨学科研究趋势明显。基于深化研究的需要,本书拟对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进行学术史梳理,并就此提出一些研究体会与设想。

(一) 多重学术背景下的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

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风气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多重国内外学术背景。统而言之,约有以下数端。

(1) 宋代家族研究风气使然。宋代社会流动是美国宋史界的一个重要议题,而家族无疑是探讨社会流动的最佳标本。戴仁柱的研究就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他对史氏家族兴衰史的描述正说明了这一点。其后,我国港台史学界受到美国史学界这一研究风气的影响,对宋代家族的关心逐渐增多,如黄宽重在有意开展宋代四明地区家族研究时,为了不与戴仁柱的研究重复,“就避开史氏家族,转而从袁氏家族入手”^③。对于黄宽重的研究,张邦炜在《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读后》一文曾有评说。他借

① 张如安编:《宁波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资料索引(1900—2008)》,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年。

② 张如安编著:《宁波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资料索引续编(1900—2014)》,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③ 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序》,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评论该书之机，对宋代家族研究的历史得失做了总结，认为宋代家族史研究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拓展：“进一步凸现地域个性”“进一步把握时代共性”“进一步做长时段研究”^①。当然，张邦炜一文的意见是基于已有宋代家族研究的成果提出来的，从马雪、吉成名的《1991年以来宋代家族史研究述略》^②、粟品孝的《宋代家族研究论著目录》^③及《宋代家族研究论著目录续一》^④等文所收罗的成果来看，宋代家族研究作为宋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确实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2) 宋代家族文学研究风气的影响。家族文学研究是宋代文学研究的新风气，在此方面，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⑤可谓开风气之先。彭玉平《宋代家族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拓荒之作——评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一文曾谈到该书对于宋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作为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一翼，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性别文学等一样，研究空间十分巨大。虽然魏晋和唐代家族文学研究已有一定之规模，但空白和缺失仍多。至于宋代家族文学的研究，则尚处于起步阶段。相信随着学术界研究格局的调整和关注中心的转移，宋代家族文学这一广袤而丰富的宝藏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度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张剑博士的澶州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是这一领域最初的一个亮点，其学术理念和研究模式，可能也会对此后的同类研究给予启迪。^⑥

在此之后，张剑、吕肖奂、周扬波的《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接续前书关注领域，视野更加开阔，可视为宋代家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典范之作^⑦。他们从文学角度切入史氏家族研究，无疑受到了这一研究风气的影响。

(3) 地域文化研究风气所致。史氏家族作为宁波历史上的望族，对

① 张邦炜：《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读后》，《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② 马雪，吉成名：《1991年以来宋代家族史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4期。

③ 粟品孝：《宋代家族研究论著目录》，《宋代文化研究》第八辑，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

④ 粟品孝：《宋代家族研究论著目录续一》，《宋代文化研究》第十三、十四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⑤ 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

⑥ 彭玉平：《宋代家族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拓荒之作——评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⑦ 张剑，吕肖奂，周扬波：《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它进行研究是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研究者如张如安、俞信芳等人生活在宁波，很多研究工作如俞信芳的两项史浩研究都获得了浙江省市两级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立项资助，而陈恩黎与郑传杰、郑昕的相关研究成果则由宁波出版社予以出版，由此可见地域文化研究与史氏家族研究的联系所在。

(4) 宗族文化研究风气的影响。在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中，史氏后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史美露、史美珩等史氏后人将对祖先的怀念融入具体的研究工作之中，一些网站如史氏春秋网也对推动史氏家族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二) 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的材料整理与研究

材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曾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主张“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之间要相互参证；对于“材料”的搜集与使用常常决定了研究的广度、深度与可靠性。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的材料整理与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其中不乏新材料与新见解。

(1) 著述。南宋四明史氏家族著述虽然丰富，但流传至今的仅有史浩的《鄮峰真隐漫录》《尚书讲义》及史弥宁的《友林乙稿》三种。《鄮峰真隐漫录》为史浩文集，有四库全书本、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等。《宋集珍本丛刊》第四十二、四十三册影印该书，是以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为底本的。今人俞信芳从事该书校点工作，以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为底本，校以清抄本、明抄本、四库本、永乐大典等，并“所辑佚文、佚诗，计五十二篇”（《史浩集·前言》）。此点校本《史浩集》三册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出版。《尚书讲义》共二十卷，有四库全书本。陈良中《史浩〈尚书讲义〉思想研究》一文对于此书的成书、流传及价值有详细讨论^①。

(2) 家谱。如《四明古藤史氏宗谱》《萧山史氏宗谱》等谱牒文献一向为研究者所看重，为勾勒史氏家族世系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史美珩《中华姓氏谱·史姓卷》以之为主要基础，在宏观描述史姓历史的同时，尤详于宋代四明史氏^②。该书第三章专论四明史氏，对其世系迁徙情况、兴衰过程及原因进行探究，而其他各章则论述了史氏家族代表人物（史浩、史

① 陈良中：《史浩〈尚书讲义〉思想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历史文献研究》第33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② 史美珩：《中华姓氏谱·史姓卷》，北京：华艺出版社，2002年。

弥远、史嵩之、史宇之等)及史氏家训。

(3) 遗物。《史家祖宗画像、传记及题跋》包括 31 位史氏家族代表人物的画像及传记,亦有若干清人题跋,原藏于宁波史家祠堂,由宁波市江东区档案馆于 1992 年征集收藏,直到 2004 年始由该馆刊行。对此遗物,学界比较重视,杨古城《南宋史氏祖像的绘制年代与冠服考》一文认为,这些画像乃“宋元初绘,明清重绘”,并据之探讨了南宋衣冠服饰制度^①。刘恒武、王力军《宁波〈史家祖像、传记及题跋〉探析》一文看法有所不同。他们认为,“《传记》底本以及大部分《祖像》属明代成化至万历之间作品,其援引资料丰富,叙述客观周全,可补正史、方志史氏文献之不足,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史家祖像》中 24 帧明代旧作画功精湛,笔道纯熟,不仅极具文物艺术价值,而且是明代浙东画史研究的珍贵资料”^②。

(4) 遗迹。史氏家族墓葬、石刻散见于宁波东钱湖周围,20 世纪 90 年代初,宁波市鄞州区文物管理处陈万丰及当地的艺术史专家曹厚德和杨古城曾着手编辑相关遗迹目录。1994 年,曹厚德与杨古城以《林染桥史氏家乘》和《四明古藤史氏宗谱》为依据,辑成《东钱湖南宋史氏望族职官、墓葬情况简表》^③,从文献上勾勒了史氏家族成员的葬地、寺庵、墓志等情况。陈镗则在 1996 年进行了实地考察,并相继写成《浙江鄞县东钱湖南宋神道石刻调查》^④、《鄞县东钱湖南宋神道石刻艺术初探》^⑤等文。2001 年 6 月,东钱湖南宋石刻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并由此建成了东钱湖南宋石刻博物馆。目前,对于史氏家族墓葬、石刻最为全面的介绍见于周时奋《略谈东钱湖石刻》^⑥一文,共计 20 多处。

除上述研究情况外,对史氏家族材料整理贡献最大者,当属史美露女士。她于 2001 年编成《四明史氏》一书(未公开发行),汇辑史氏资料,颇为丰富。如该书第二部分“史氏资料汇辑”收有历代史氏谱牒序跋、人物传记、敕命记序等 125 篇,第三部分“史氏画册光芒永存”收有《史家祖宗画像、传记及题跋》,第四部分“宁人研究四明史氏”,收录今人曹厚德、杨古城两人的史氏研究文章十余篇,第五部分“四明史氏遗迹实物佐

① 杨古城:《南宋史氏祖像的绘制年代与冠服考》,《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

② 刘恒武、王力军:《宁波〈史家祖像、传记及题跋〉探析》,《南方文物》2008 年第 2 期。

③ 史美露:《四明史氏》,内部资料,2001 年;仇国华主编:《宁波东钱湖历史文化·四明史氏篇》,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

④ 陈镗:《浙江鄞县东钱湖南宋神道石刻调查》,《南方文物》1998 年第 4 期。

⑤ 陈镗:《鄞县东钱湖南宋神道石刻艺术初探》,《东南文化》1999 年第 5 期。

⑥ 周时奋:《略谈东钱湖石刻》,《故土家园》下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年。